

张海鹏先生

八秩初度纪念文集

Commemorative Edition for
the 80th Anniversary
of Mr. Zhang Haipeng's Birth

李细珠 赵庆云◎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张海鹏先生 八秩初度纪念文集

Commemorative Edition for
the 80th Anniversary
of Mr. Zhang Haipeng's Birth

李细珠 赵庆云◎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张海鹏先生八秩初度纪念文集 / 李细珠, 赵庆云主

编.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 5

ISBN 978-7-5201-2521-5

I. ①张… II. ①李… ②赵… III. ①中国历史-近代史-文集 IV. ①K25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64879 号

张海鹏先生八秩初度纪念文集

主 编 / 李细珠 赵庆云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宋荣欣

责任编辑 / 楚洋洋 吴丽平 李蓉蓉 李期耀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近代史编辑室(010)59367256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41.25 字 数: 675 千字

版 次 /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201-2521-5

定 价 / 19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张海鹏

1939年5月生于湖北省汉川县。1964年7月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学系。1964年8月进入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1977年后改属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1979年评定为助理研究员，1985年评为副研究员，1990年升任研究员。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首席专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中国历史学科评审小组召集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主任、国台办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学术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史学理论研究中心顾问、教育部统筹推进“双一流”大学专家委员会委员、新华通讯社特约观察员、山东大学特聘一级教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等。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史哲学部副主任、中国史学会会长、中国孙中山研究会会长、中国义和团研究会理事长、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兼历史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成员等。学术专长为中国近代史研究，主要学术成果有《中国近代史稿地图集》《追求集：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探索》《张海鹏集》《张海鹏自选集》《中国近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书生议政——中国近代史学者看台湾的历史与现实》；主编有《中国近代通史》（十卷本）、《台湾史稿》（两卷本）以及“马工程”重点教材《中国近代史》等；发表有关中国近代史研究理论方法、中国近代史专题研究和涉及香港、澳门、台湾以及中日关系问题等各类文章约400篇。

目 录

- 我的学术，我的理想，我的人生 张海鹏 / 001
- 论清代的省例 徐 鑫 / 033
- 长生、济世及一统：郑观应的仙道梦 马平安 / 053
- “尖阁问题”内在的法理矛盾
——旨在驳斥“固有领土”论 [日]羽根次郎 / 081
- 赫德与中日甲午战争 张志勇 / 093
- 载沣与清末海军的“兴复” 李学峰 / 117
- 再论“内外皆轻”权力格局与清末民初政治走向 李细珠 / 137
- 从文化帝国主义到文化国际主义：美国传教士对中国
文化态度的演变（1907~1932） 王立新 / 164
- 《驻汉五国领事严守中立布告》难言“中立” 朱文亮 / 189
- 汤孙分裂与民初政局 郝幸艳 / 204
- “同化会”与台湾近代民族民主运动的开启 李 理 / 222
- 蒋百里的抗战救国思想与实践 杜继东 / 242
- 宋斐如的对日经济研究述论 赵一顺 / 268
- 山海重光：崂山道教与近代中国革命 朱修春 何建华 / 291
- 中共参政员与国民参政会（1938~1945）
——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视角 王凤青 / 304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黄河堵口中的工赈	鲍梦隐 / 325
光复初期台湾的女性	
——1945~1949年大陆期刊所做的观察	许毓良 / 340
“出而不战”：中国出兵朝鲜决策的再探讨	[韩] 金东吉 / 366
试论吴国桢案与孙立人案前后蒋介石之心路	冯琳 / 395
专业史家与“四史”运动	赵庆云 / 421
新中国成立初期维护海洋主权的探索	兰波 / 440
20世纪90年代台湾当局南海政策研究	
——以“南海小组”为中心的考察	翟金懿 / 449
天使与魔鬼，历史与现实：新世纪以来网络义和团	
运动论帖评述	袁博 / 466
论史学研究的“实”与“虚”	武吉庆 / 478
历史虚无主义研究	龚云 / 488
民进党“新南向政策”与台日合作	王键 / 502
永远的精神家园	
——张海鹏先生访谈录	
..... 李细珠 张志勇 赵庆云 访谈整理 / 512	
八十初度自订年谱简编	张海鹏 / 574
后记	653

我的学术，我的理想，我的人生

张海鹏

我出生在1939年5月。那正是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的时候。我的家乡在汉口以西不过50公里的汉川县农村。大革命时期汉川县是农民运动活跃的地区之一，还成立过苏维埃。日本侵略军到过那里。新四军也在那一带活动。我记得，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队在那里驻扎。我上过一年私塾，1946年上小学。我的小学时代基本是在战争环境下度过的。

1951年小学毕业，考上湖北省立马口中学（省重点），1954年初中毕业，考上了湖北省孝感高级中学。1954年的长江大水，冲掉了我上高中的梦想。1954年7月到1956年8月，我在家乡种田，当了两年农民，参与了互助合作运动全过程，当过高级农业社会会计。1959年高中毕业，考上了武汉大学历史学系，在那里受到了良好的大学教育，也经历了从三年困难时期到经济恢复时期的全过程。

我在大学的学年论文做的是秦汉之际的游侠，毕业论文做的是苏美建交问题。我本来想报考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侯外庐先生的研究生，临考前历史系党总支通知我，要我报考外交学院，我考上了外交学院外交研究班。我没有能够去读外交学院研究班，却被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要来了。此后，我的人生和我的学术道路，就与近代史研究所紧密联系在一起了。

我在近代史所经历的“四清”与“文化大革命”

1964年8月中旬，我从武汉大学历史系毕业后，进入了中国科学

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隶属于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那年，我刚满 25 岁，青春焕发，正是激情燃烧的岁月。能进入首都北京，能走进最高科学殿堂，心情无比激动。但是，在最高科学殿堂里，真正从事中国近代史的学术研究，却是在 13 年以后，即在 1978 年以后，1979 年，我就满 40 岁了，刚刚评上了助理研究员。那一年，两鬓已初现华发。比起现在 30 多岁就当了教授的后学者，我的内心是羡慕的。

到所里报到后两三天，所里派我和郭永才到西颐宾馆（今友谊宾馆）报到，那里正在举办 1964 年北京科学讨论会，我们去做会议服务工作。我被分配在政法组，给政法组中国代表刘思慕做秘书，整理会议记录。郭永才被分配在历史组。在那里服务 14 天，回到所里，就准备参加“四清”。

“四清”是俗称，正式称呼是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近代史所与拉美所一起，去甘肃河西走廊的张掖。这是中央统一部署的。行前学了一个月文件，包括“前十条”、“后十条”、刘少奇讲话、王光美的“桃园经验”等。

我记得，临行前，范老（近代史所所长范文澜）在大会议室举办全所宴会，为参加张掖“四清”的同志们壮行，他还特别把张闻天同志的夫人刘英同志介绍给大家。1959 年反右倾以后，张闻天被安排在学部经济所，刘英被安排在近代史所。去甘肃前，所内团支部改选，原书记仍旧，增加了一名副书记张友坤（所党支部青年委员），增加我为支部委员。接着在全所大会上，刘大年副所长总结了一个月的学习，张崇山副所长做了临别赠言，我代表团支部读了决心书。10 月 30 日抵达张掖县城，学习一周，主要是了解张掖地区情况，学习西北局、甘肃省委关于“四清”的文件，传达甘肃省委“四清”工作团对工作队员的纪律要求等。

我和王忠先生（副研究员，专长西藏史，已过世）分在张掖县乌江公社贾家寨大队二队（包括任家庄、周家庄、褚家庄），开始住在任家庄一户农民家里，后来住进周家庄一个周姓农民家里。贾家寨大队工作队负责人是近代史所副研究员蔡美彪。

我们在张掖农村生活了 8 个月。我们的工作，按照“桃园经验”是“访贫问苦”，发动群众揭发生产队干部的“四不清”问题，逐一落

实。经过一段时间调查，发现当地情况不像“桃园经验”所说的那么严重，生产队干部“四不清”也就是稍微多吃几斤粮，有些男女关系。“访贫问苦”一个月左右，没有发现十分严重的问题。“四清”工作本身并不重。1965年2月，中央有新的文件俗称“二十三条”发下来，学习后觉得很高兴。“二十三条”提出了“党内走资派”，这个概念一出来，我们觉得生产队、生产大队没有党内走资派，所有干部一律解放。1965年5月，结束“四清”工作，离开村子时，当地干部群众都来欢送，似乎有点难舍难分。而我的实际感受是，“二十三条”纠正了“桃园经验”的偏差。2013年7月我顺道到贾家寨探访，遇到了当年生产队褚队长，他还认识我。他说当年工作队把他们都解脱了，没有留下后遗症，很是感谢。

1965年6月中旬，1964年进所的大学生就转到山东黄县（今龙口市），住进于口大队上孟、下孟、于口几个生产队里，目的是完成国家规定的大学生劳动锻炼时间。这个生产队在山区，没有平地，主要在山上经营果树，主产梨。我们在山上同农民劳动了7个月。在这个过程中，我更多地认识了中国的农村。1948年淮海战役，黄县各村里的农民，男子都推着小车支援前线，为淮海战役的胜利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后来陈毅元帅说过淮海战役的胜利是山东农民用小车推出来的，我们在黄县农村有了比较切身的感受。

1965年11月，在黄县县城做劳动锻炼总结时，看到了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回到北京以后，近代史所副所长黎澍同志找我谈话，让我写批判吴晗的文章。那个时候批判吴晗，是一种学术批判。他给我布置一篇评《海瑞罢官》的文章。我花了一个月时间，写好了给他看，他对我的文章不满意，对我说还是去读书吧，要我多读点书。实际上，那时对吴晗的批判已转向政治批判，学术批判做不下去了。黎澍主编的《历史研究》受到的压力非常大，他很着急。

此后，近代史所组织第二批“四清”工作，地点是江西。所里没有让我去，黎澍先生安排我到西郊组，住在西颐宾馆（今友谊宾馆）的中馆。西郊组是黎澍领导的，1963年建立，对外名称叫“中国近代史讨论会”。西郊组的活动对外是保密的。这个组的任务，是为外交部中苏谈判代表团准备中俄边界问题资料。

这期间，学部各研究所除了批判吴晗，还批判“三家村”、“青春

漫语”。“青春漫语”是《北京晚报》开辟的一个杂文专栏，执笔者是学部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杨述。那时候，各大报纸大张旗鼓批判“三家村”，学部则在组织批判“青春漫语”。批判的材料都印出来发给我们，各所都开批判会。1966年5月下旬，学部大院贴满了大字报，大多是《哲学研究》编辑部署名的，矛头直指杨述及其《青春漫语》。5月30日，近代史所召开全所（部分人员在江西“四清”）大会，批判《青春漫语》。我被安排第一个发言。西郊组党分支部决定大家可以写大字报，参加“文化大革命”。学部《新建设》编辑部在近代史所张贴大字报，揭发副所长黎澍替《光明日报》写的评论员文章《让青春放出光辉》是大毒草。黎澍是大家都很尊重的理论家、近代史所领导，忽然被揭发，我的心里很不平衡。我写了一份大字报，质问黎澍何以写出那样的大毒草。于是一批批判黎澍的干部路线的大字报在西郊组和所里贴了出来。

1966年6月4日，学部在首都剧场召开全学部大会，批判《青春漫语》。近代史所挑选了我和沈庆生到学部大会上发言。前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夺取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还配发了史绍宾的长篇文章，点了《历史研究》和近代史所的名，指出这些资产阶级“权威”老爷们，是史学界的“东霸天”、“西霸天”，他们像奸商一样垄断史料，包庇吴晗。社论批评的矛头直接针对近代史所。清早就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这篇社论。那时《人民日报》的社论就相当于中央的最高指示，社论点了近代史所的名，就等于被中央点名。第二天我要代表近代史所在学部大会上发言，我想，前一天有社论，我第二天代表近代史所发言，应该回应一下社论。我就在发言稿的最后加写了几句话。我把这个发言稿给西郊组的负责人余绳武同志看。他没有反对，说可以。随后我知道西郊组内有不同意见。余绳武告诉我，是否讲以及如何措辞，由我决定。6月4日，学部批判杨述大会上，学部分党组成员（包括潘梓年、关山复、刘导生等以及刘大年等领导同志）坐在主席台上。按照大会安排，我是第四个发言。我在批判了杨述《青春漫语》后，在结语里结合“6·3社论”对刘大年提出了质询。我说，我们一定团结在党中央和毛主席周围，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向一切牛鬼蛇神开火，彻底打倒盘踞史学界的资产阶级的“东霸天”、“西霸天”，夺取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台下有人高呼刘大年下台。哲

学所、《哲学研究》、《新建设》等单位的一些同志认为学部党委特别是关山复包庇杨述，把矛头对准学部党委，刘亚克等人上台争夺麦克风。我想，这次大会应该是学部“文革”的正式开始。

接着中央就向学部派了工作组。工作组组长是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张际春。近代史所也来了工作组，组长是中央组织部办公厅主任王瑞琪，副组长是中央联络部调查处的处长（相当于今日的局长）时代。所里当时有一个党支部（其作用相当于后来的机关党委），支部书记是连燎原，他是转业军人。他通知在6月15日开会，布置在所内开展文化大革命。那时我在西郊组，脱离了所里，不知道所里在酝酿什么。6月15日上午，部分党支部、团支委和部分青年党员商讨当天大会召开问题，主要是确定由谁来主持大会。工作组组长王瑞琪、副组长时代等已经到所。大家要求工作组主持会议，工作组表示刚到所，不了解情况，不能主持会议。后来经过大家讨论，七嘴八舌，决定民主选举大会主席团。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了张德信、郭永才、余绳武、蒋大椿和我组成的主席团，主席团推举我为大会主席。我就主持了6月15日的全所大会。我根据《人民日报》的社论讲了一些看法，大家鼓掌通过，这就算本所“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随后成立的近代史所“文革”领导小组里，我担任副组长。组长还是学部“文革”小组（后来是学部联络委员会）成员，所里的工作主要由我来管。这样我就成了近代史所的“造反派”。

“文化大革命”初期，我主持近代史所工作期间，主要是抓所谓斗争大方向，始终抓的是所谓“党内走资派”，始终抓的是批判刘大年和黎澍先生。对其他人，触动不多。在我后来挨整的时候，所里有的老知识分子，像邹念之先生，还有荣孟源、金宗英、丁原英等先生都替我说过好话。

1968年2月，我所在的群众组织垮台。这是因为它的后台戚本禹垮台。此后，我就被所内反对派群众组织控制起来了。

1968年12月，中央向学部和所属各所派来了工宣队和军宣队。1969年上半年，工宣队、军宣队在所内做团结工作，消除派性。我自己清查思想，清查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言行，检讨并反思自己。下半年就开展“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运动”。从此，我被作为“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骨干，成为清查运动中的重点审查对象，

经历了长达5年的艰难岁月，经历了严酷的政治审查和心理考验。这是我此生最痛苦的时期，最无奈的时期，最无助的时期，最感到迷茫的时期。

1970年5月30日，工宣队押送我去河南息县五七干校。此前，我被关押在“文联大楼”（今商务印书馆）和美术馆，长达七八个月，完全失去自由，被迫交代问题。到了干校，我被编入二排八班。二排任务是盖房。分配我的任务是拿瓦刀砌墙。半年之内，盖了5栋里生外熟的房子，解决了全连（近代史所、考古所）住房和办公问题。在干校，白天盖房，晚上接受审查，开批判会，清查所谓“五一六”问题。

1971年1月，学部干校离开息县，搬到明港军营。在息县干校，主要精力是体力劳动，建设干校。到明港军营，目的是集中一切时间和精力，掀起“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高潮。

11月，学部军宣队在某范围内传达中央有关林彪事件文件，我被允许参加。“五一六分子们”很高兴，大都坚持整了“无产阶级司令部林副统帅”的黑材料，弄得军宣队很尴尬。军宣队批判说，林彪是“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新的黑后台。此后清查“五一六”运动无法进行下去。2015年9月我到成都出席会议，顺便到安仁镇建川博物馆，看了那里收藏的原学部军宣队总指挥余震副军长的有关材料，发现当时军宣队内部对清查运动有分歧，“清查”推动不下去，军宣队几次向中央报告，要求撤出学部。看来，那时主持学部“清查运动”的军宣队是左右为难的。

到了1972年，“清查运动”就冷清了。1月，我在营房里闲来无事，借来林庚、冯沅君主编的《中国历代诗歌选》上编和《唐诗三百首》、龙榆生编选之《唐宋名家词选》，抄写并诵读。又读《史记》列传，写读书心得。我在行动上还是不自由的，但是看这些书，已经没有人来干预了。

7月，学部五七干校全体回到北京。回到所里后，依军宣队规定，我依然处在被监督下，不能自由出入，每天在大院里扫马路、扫厕所，与所里瓦匠师傅一起到屋顶补漏。记得1973年起，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开播英语和日语广播，我利用晚上和早晨听，也试着翻译美国出版不久的包华德主编的《民国人物传记辞典》，我翻译了一百多个人物词条，送给刚参加民国人物传写作的同辈朋友参考。1972年下半年，所里成

立民国史组，由李新领导。许多年轻朋友都可以进入民国史组，我被排除在外，心里自然是难受的。

1974年12月某日，工宣队和军宣队负责人找我谈话，对我宣布了经学部领导小组批准的结论，大意为：经审查，我的问题不属于“五一六”问题，没有“五一六”错误，更没有“五一六”罪行；“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极左思潮影响，由于识别不了王关戚，犯了一些错误，但这些不属于清查范围，今后好好总结经验就行了。随后召开全所大会，正式宣布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一般性路线错误”，解除对我的审查。1975年初，军宣队通知我，可以选择一个研究组。我选择了翻译组，当时还想提高一下外文水平。翻译组懂各种文字的人都有，英文、俄文、日文好多种文字，一些人水平很高。实际上，“文化大革命”运动还在进行中，没有多少时间工作，很难达到提高外文水平的目的。

1975年上半年，近代史组何重仁先生与龙盛运同志多次找我谈话，让我到近代史组来，不要在翻译组耗时间了。后来他们在谈话中流露出是刘大年同志要我去政治史组。我很感动，没有多想，在1975年9月就去了近代史组（经过军宣队批准）。近代史组正在学习和讨论毛泽东的“评水浒”，实际上是批投降主义，组里提出怎样结合近代史研究，把毛主席的这个指示贯彻到近代史研究中来。讨论的结论是，要结合太平天国、结合李秀成，李秀成当时是投降主义，用这个事例来说明毛主席“评水浒”的一些道理。组里把写文章的任务交给我，给了我两个月的时间。我从接受任务的当天，就全心全意地投入太平天国史研究，这是1964年8月到所里以后，我第一次接受研究工作任务。

我用三个月写了一篇文章。我的文章针对的主要对象是上海的罗思鼎和北京的梁效。罗思鼎、梁效在批林批孔中发表的政论文都涉及太平天国，我的文章主要是从观点上针对他们。我把文章送请何重仁、钱宏、龙盛运看，他们都感到很满意。最后我还送给刘大年同志看，这是我第一次给大年同志看我的文章，他看过后从结构上对文章做了调整。

1975年底，当时学部领导小组经中央同意，决定要把《历史研究》从国务院科教组拿回来，还是请黎澍先生来做主编。黎澍上任前开过几次座谈会，请北京及外地的一些学者来，讨论如何接办《历史研究》。所里党总支派我做会议记录，然后整理座谈纪要。第二次座谈会散会

后，我把我写的文章交给黎澍同志。这篇文章就在《历史研究》1976年第1期发表了。这正是黎澍重新接手后的第一期。那篇文章我认为在学术本身还是站得住脚的。关于太平天国的土地制度、太平天国在苏南地区的一些土地政策等研究，还是我的研究心得。但是那时还在“文化大革命”中，写文章，因为按照毛主席“评水浒”的意思，我心里又针对罗思鼎与梁效的那些观点，所以不免带有“文化大革命”时期写文章的风格，而且结尾还联系到苏联修正主义进行批判，但是文章的主体部分还是一种纯粹的历史研究。

在近代史组，除了写文章，我还接受了一项安排，协助刘大年同志做些《中国近代史稿》的辅助工作。刘大年从1971年4月离开干校回京，接受郭沫若院长的任务，把1962年出版的4册《中国史稿》扩编为10册，前7册为古代史，由历史所尹达负责，后3册为近代史，由刘大年负责。刘大年建议，后3册独立出来，称为《中国近代史稿》，获得郭沫若同意。1975年底我参加《中国近代史稿》工作的时候，主要是协助刘大年处理稿件，核对注释。《中国近代史稿》撰写初稿的作者有丁名楠、钱宏、樊百川、刘仁达、金宗英、张振鹞、王明伦、龙盛运、严敦杰、俞旦初等人，初稿经钱宏处理交给刘大年。刘大年改过的稿子再交给我，由我来整理并核对史料出处。我看到刘大年改过的书稿，几乎看不清原稿的模样了。此外，我还负责为书稿选择历史图片、编绘历史地图。《中国近代史稿》第1册在1978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1975年，在军宣队领导下，近代史所建立了党的总支部，刘大年任书记，郭永财、黎澍、李新任副书记。我被安排协助刘桂五先生做学术秘书的工作。我还受所里委托协助刘桂五抓“开门办所”，到北大历史系、天津历史所做了调研，组织本所人员到房山南韩继村割麦，到北京内燃机总厂学工，最重要的是与北京印刷系统工厂合办了“七二一大学”，编写了讲义，组织所内研究人员讲中国近代史。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光明日报》举办座谈会，揭露和批判“四人帮”在史学界的罪行，所里党总支推荐我出席会议，我在座谈会上的发言被刊登在报纸上。

1977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正式成立。院里安排“清理帮派体系”工作。“清理四人帮的帮派体系”是当时中央的精神。如何清

理，如何正确处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各种复杂的关系，就看各单位负责人的做法。近代史所“清理帮派体系”领导小组在组长李新的领导下，把刘大年、郭永才、张友坤和我作为“四人帮的帮派体系”，加以批斗。大多数人不支持这样的做法，许多人对我表示了同情和支持，我一点也不感到孤立。近代史所的这种过激倾向，到年底就烟消云散了。

1978年，社科院进行了改革，各所组建了研究室，组建了科研处。1978年开始，我进入了真正的学者生活，努力抢救失去的时间，一心一意展开自己的学术研究。在这样的条件下，度过了我从事纯粹学术活动的10年黄金时间。

钱钟书在为杨绛《干校六记》写的小引中说：“在这次运动里，如同在历次运动里，少不了有三类人。假如要写回忆的话，当时在运动里受冤枉、挨批斗的同志们也许会来一篇《记屈》或《记愤》。至于一般群众呢，回忆时大约都得写《记愧》：或者惭愧自己是糊涂虫，没看清‘假案’、‘错案’，一味随着大伙儿去糟蹋一些好人；或者（就像我本人）惭愧自己是懦怯鬼，觉得这里面有冤屈，却没有胆气出头抗议，至多只敢对运动不很积极参加。也有一种人，他们明知道这是一团乱蓬蓬的葛藤账，但依然充当旗手、鼓手、打手，去大判‘葫芦案’。按道理说，这类人最应当‘记愧’。”我看了《干校六记》，心情很激动。

过去，我们理想主义太多，对共产主义具有急迫感，对社会现实缺乏切实的体验。“文化大革命”中我们的实际经历，使我们认识到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到达理想的路是不平坦的。这样的认识对我的人生是很重要的，通过“文化大革命”这样一个挫折和锻炼，引起了一些思考。我们过去的理想主义，包括共产主义很快就要到来、“大跃进”，这些我都是经历过的。那个时候我们意气风发，“大跃进”时我正好是十八九岁，土改、互助组、合作化、人民公社化，都是经历过的。“文化大革命”以及“文化大革命”过去以后，我们经历过了，才认识到，理想和理想的实现中间是差距很大的。这可以说是“文化大革命”10年给我的一个最基本的影响：懂得了通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道路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共产主义的理想是好的，但到达共产主义的道路绝不是笔直的，共产党内的思想倾向绝不是铁板一块的。

这是我离开大学后，通过“文革”上的最重要的一课。

我的学术和事业

1978年至今，我在学术和事业方面尽管不很满意，还是做了一些事情，下面做一点概略回顾。

在学术方面：

第一件，参与了刘大年先生主持的《中国近代史稿》1~3册（1978~1984年出版）和4、5册（未完成）的工作，负责组织稿件、整理书稿、核实注释、搜集图片和编制附件以及联系出版，完成了《中国近代史稿地图集》（地图出版社，1984）的编绘和《简明中国近代史图集》（长城出版社，1984）的编撰，受到了参与通史类著作编撰的工作训练，初步奠定了学术基础。我记得《中国近代史稿地图集》出版后，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谭其骧教授写信来表示祝贺，本所民国史研究室主任孙思白教授对我说，这本书的出版奠定了你在学术界的地位。

第二件，做了若干涉及太平天国史、洋务运动史、义和团历史、辛亥革命史、留学生史、皖南事变历史、抗日战争史和二战史以及中日关系史的专题研究，发表了若干篇学术论文，为相关研究领域留下了若干铺路石子，可以留作后起的研究者参考。这些学术论文，至今读来，尚不觉落伍。这些论文，分别收集在《追求集——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探索》、《东厂论史录——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评论与思考》两本论文集中。我还对孙中山、毛泽东做过一些研究，发表过多篇论文。

2004年我在《抗日战争研究》上发表《试论当代中日关系中的历史认识问题》一文，对中日关系的发展现状、中日关系中的历史认识问题、关于战略集中原则以及中日关系的发展方向等学术界认识比较混乱的问题提出了讨论。2015年在《中共党史研究》上发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的宏观反思》对二战史做了总的回顾，认为二次大战从开始到结束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它从酝酿、爆发到高峰再到结束，原因都极为复杂。我们必须看到，二次大战有两个战争策源地，有两个爆发点或者起点，有两个主要战场，有两个战争结局和战后对战争的不同认

识。在这个总体认识下，阐述了中国抗日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东方主战场。

我在抗战史研究上的贡献，主要是努力论证抗战中存在着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两个领导中心，用这个观点解释抗战的全过程。今年（2017）我针对抗日战争是14年还是8年的争论发表了几篇网络文章，提出了我的基本观点，引起了学术界广泛注意。

第三件，在香港史、澳门史、台湾史以及两岸关系史方面，撰写了一系列文章和论文。其中，多篇台湾史和两岸关系史的论文在台湾的报纸和刊物上发表。主持编写并出版了《台湾简史》和100多万字的《台湾史稿》。有关台湾历史与现实方面的文章，九州出版社在2011年初出版了我的专集《书生议政——中国近现代史学者看台湾的历史与现实》。此书此前在台湾海峡学术出版社出版。

第四件，为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的发展做出了探索，就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一些理论和方法问题发表了系列论文，贡献了个人的绵薄之力。2008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我个人的文集《张海鹏集》，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集之一。这本文集编入了我在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方面的诸多探索与思考。2009年，我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分期问题》，在《历史研究》发表了《六十年来中国近代史学科的确立和发展》，在《近代史研究》发表了《60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有关理论与方法问题的讨论》等论文，进一步从理论和事实的角度总结了近代史学科体系问题。这些文章，正在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我和我的学生龚云合著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我和我的另一学生赵庆云合著的《试论胡绳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试论刘大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论牟安世先生的中国近代史研究》，都可以算作探索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的作品。我探索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的心得和主张，体现在1999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史（1840~1949）》和2007年出版的《中国近代通史》（十卷本）中。

1998年我在《近代史研究》发表《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分期及“沉沦”与“上升”诸问题》，对近代中国的历史发展规律进行探讨，提出了近代中国经历了“沉沦”、“谷底”和“上升”的规律性变化。2007年在首尔大学东亚文化研究所《东亚文化》发表《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与转折》，从另一个角度探讨了近代中国历史发展规律。